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作者：田一，王莉，许燕，焦丽颖

### 第一轮

####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对于善念的研究，诚如文本中所言，对于回应文化传统和当下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经过实证之后完善的社会善念界定（5.3 部分）更精细；而词表、评定量表的编制规范，有关工具设计为相关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

**意见 2：**1.建议斟酌题目“中国文化下的...”表达。“中国文化下的”的意思非常模糊，建议澄清或改用其他表达。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提供的意见。我们认真采纳了专家的建议，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思考，虽然社会善念的测量范式以及使用范围更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但是文化的差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仅仅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还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强弱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男性化和女性化等其他维度（Hofstede, 2001）。因此，题目界定为“中国文化”有些模糊，同时结合前人对于中国特色下的本土化人格研究思路，将题目更改为“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和内涵”，更聚焦人的因素，将中国文化（特别是集体主义文化）作为引言背景提出。

#### 【参考文献】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意见 3：**2.在 1.1 部分总结善念是一种情景、两种能力，即在人际互动情景中，觉察他人状态的知觉能力和尊重与让渡的意愿。开放式问卷采用了场景介绍，很好地体现了情景性，传递了善念的能力和意愿。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对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肯定。

**意见 4：**3.3.3 部分获得的三个因子，分别是善良尊重的个人特征、对待他人的包容理解，以及对待世界的乐观豁达。三个因子的内容和逻辑清晰，但似乎只有 S2 明确的是社会性的，S1 是社会性的个人特征，这两个符合前述的理论和资料采集策略，但 S3 似乎不直接表达一种情景、两种能力。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对于研究 2 中三因子结构的提出，虽然在内容和逻辑方面尽量表达清晰，但是对于三因子内容的描述有些不够明确。鉴于此问题，研究做了两个方面的调整：第一，将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修正为情境、能力和意愿，而意愿带有开放的性质，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表达。第二，将 S3 因素的内涵命名，更新为“积极开放”，体现自愿拥抱世界、与人交际，并且有主动愿意让渡选择权的开放性。

**意见 5:**在 4.3 中,对应的可以看到“T6 对待生活和工作...”和“T14 对于未来的生活...”及“T18...积极主动地工作或学习”所表达的内容没有指向人际情景或他人。有关内容界定为人际特质(5.2 部分)是否恰当?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中肯的建议。关于 T6、T14、T15、T18 这些题目所表达的内容,从人格的高阶因子证据来讲,代表的是可塑性(Plasticity),是探索和积极行为的基础,指向外向性或经验的开放性(DeYoung, 2006),是面向外部的。从人际特质的概念界定来讲,其是由周围环境定义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人感知他人的动机倾向,从而影响行动意愿和行为动力(Ansell & Pincus, 2004; Brown, Poole, & Rodgers, 2004; Gaines, 1996; Gurtman, 2009)。题目所表达的对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同事或同学的开放性,体现在人际交往的情境中,故本部分界定为“人际特质”具有双重含义。

**【参考文献】**

- DeYoung, C. G. (2006). Higher-order factors of the Big Five in a multi-informant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6), 1138-1151. doi: 10.1037/0022-3514.91.6.1138
- Ansell, E. B., & Pincus, A. L. (2004).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 Examination Using the Structural Summary Method for Circumplex Data.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2), 167-201. doi: 10.1207/s15327906mbr3902\_3
- Brown, H. G., Poole, M. S., & Rodgers, T. L. (2004). Interpersonal Traits, Complementarity, and Trust in Virtual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4), 115-138. doi: 10.1080/07421222.2004.11045785
- Gaines, S. O. (1996).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and Gender-Role Compliance on Interpersonal Resource Exchange among Dating and Engaged/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2), 241-261. doi: 10.1177/0265407596132005
- Gurtman, M. B. (2009). Exploring Personality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4), 601-619. doi: 10.1111/j.1751-9004.2009.00172.x

**意见 6:** 3.不足与展望部分,所题的第 3 点,“对理性经济人的研究有了新的贡献和挑战”具体指的是什么? 建议明确。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这句话其实是表达当前的人格与社会心理的研究,使得像合作等具有理性经济视角的研究变得不那么理性,要综合考虑人格内涵和结构,所以带来新的贡献和挑战。但综合考虑此部分的描述,感觉这句话有些突兀,故进行删除。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本文作者采用人格词汇方法,研究了中国人(大学生)的社会善念特质心理结构和内涵。在选题上具有一定创新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

**意见 2:** 但是通读全文,存在理论建构不足、缺乏充分的相关文献分析(特别是针对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相关特质)、行文逻辑混乱以及存在大量中文表达错误、文中部分结构混乱和不符合统计学基本规范等严重问题。因此文章不能达到心理学报的创新价值和科学水准。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中肯的评价,笔者将继续进行修改完善。

**意见 3:**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举例。

## 1.引言、理论建构以及文献分析的不足

(1) 关于研究背景。纵观全文，中国文化是本研究的重要研究背景，但引言部分论述的是东西方文化因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社会善念有不同的影响（P3）。中国文化包含集体主义的特征，但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集体主义。建议作者进一步聚焦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修改相关内容。如果作者的本意是立足于更大的中国文化背景，则建议补充社会善念的中国文化研究背景与前人研究，有效论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独到专业的点评。研究将题目界定为中国文化下的社会善念的内涵和结构，确实有失考虑。综合查阅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献，也学习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仅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还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强弱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男性化和女性化等其他维度（Hofstede, 2001）。而本研究聚焦文化的视角，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社会善念传统测量范式来源于笔选择范式，本身就带有文化价值导向；第二，社会善念的应用范围大多在西方文化下，且个体主义所带来的促进聚焦（Higgins, 1998; Lockwood, Jordan, & Kunda, 2002），是导致社会善念测量结果的关键要素。故研究更多是聚焦中国特色下的集体主义文化。但综合专家意见考虑，整体研究并没有对集体主义文化有更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借鉴前人本土化人格结构的研究，将题目重新修改为“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和内涵”，将中国本土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作为研究背景进行阐述，而不是基础。

### 【参考文献】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Higgins, E. T. (1998).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pp. 1-46): Elsevier.

Lockwood, P., Jordan, C. H., & Kunda, Z. (2002). Motivation by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models: regulatory focus determines who will best inspire 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4), 854. doi: 10.1037/0022-3514.83.4.854

**意见 4：**（2）作者需要厘清引言中的几个与文化有关的概念，不能毫无逻辑地随意使用：西方文化、个体文化、中国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因为这些概念各自都有这具体的含义。例如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是不是一回事呢？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专业细致的建议。关于文化的概念，研究者查阅了关于东西方文化、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方面的文献。虽然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毫无疑问是集体主义的(杨国枢, 俞宗火, 2008)，更具体地说是垂直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Triandis, 1995)。但对于文化的复杂性，已经超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故研究尽量规避了文化的聚焦，仅从中国文化中比较典型的集体主义的背景下，引出当前的研究调查背景。并将题目修改为“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和内涵”

### 【参考文献】

杨国枢, 俞宗火.(2008).本土人格研究:中国的情况.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01),192-222

Triandis, H. C. (201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Routledge.

**意见 5：**（3）仅仅因为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笼统分析，以及简单的概念演绎（且不说作者行文的佶屈聱牙、句读不分），就认为中国人一定具有独特的社会善念，略显武断。至少可以看看已有的相关测评工具在中国人群中的应用状况如何。不能只拿来人家的概念，然后简单地摒弃原始的测评工具。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首先，对于社会善念的名词解释，研究进行了补充——最

初直译成社会正念。用提出者的观点来说,就是人们怎样以一种注意关注的方式,社会化地建构了一个情境(Van Doesum, 2016)。换句话说,就是用正念方式关注社会交际环境。由于这个概念较新,所以存在很多争议。研究表明,“社会正念”与正念注意意识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所测的正念水平没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等, 2013),同时 Van Lange 和 Van Doesum(2015)也提出低的“社会正念”相当于“社会敌意(social hostility)”,而社会敌意对应的名词应该是社会善念,而非社会正念。结合心理学报编委所提出的专业建议,国内学者最初发表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的论文中,将社会正念修改为社会善念(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2018a; 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耀中,2018b)。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以及正念所具有的佛学教义,研究认为采用心理学专家所认可的社会善念这个概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更适合学术表达,也符合中国本土化特色。故后续采用社会善念作为关键词进行阐述。——此名词带来的辨析使得其测评工具存在较大争议。

其次,社会善念的测量采用物品选择的方式,其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导向,原来用于区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取向,在应用的范围上大多在西方文化下,提出者也讲到需要有全球跨文化研究的支撑,而在中国人群中的应用状况来讲,从2016年至今,共有16篇文章涉及社会善念,其中4篇是对概念的引入和推广(窦凯等,2017; 任彧,2017; 田一等,2020; 鲁澳芬,2020),6篇是从感知社会善念的角度探索其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窦凯等,2016; 窦凯等,2018a; 窦凯等,2018b; 陈雅姣,2019; 向凌灏,2020; 杨翠,2020),还有6篇是沿用了传统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物品选择)来测量个体层面的社会善念,但是大多停留在硕士论文层面,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陈满琪,2016; 刘嘉,2018; 仇不凡,2019; 陈琪等,2020; 严益霞,2019; 包金金,2019)。

最后,社会善念不仅仅是状态性的,受物品选择情境影响的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特质——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善念的表现恰恰是内心稳定的人格特质所决定,而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状态性的变化,因此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善念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特质”(窦凯等,2017, p. 1108)。实证研究也表明了社会善念既有类特质的特征,又有类状态的特征(Mischkowski, Thielmann, & Glöckner, 2018)。

综合以上原因,研究很有必要在社会善念传统测量方式之外,探索其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的本土化心理结构和内涵,并研发相应的测量工具。

#### 【参考文献】

- 任彧.(2017). 社会正念中的利他选择综述. *科教导刊(中旬刊)*(05), 147-148.
-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 张庆鹏.(2017). 人际互动中的社会善念: 概念、测评及影响机制. *心理学进展*, 7(9), 1101-1112. doi: 10.12677/ap.2017.79138
- 田一, 王莉, 许燕 (2020). 社会善念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心理学进展*, 10(8), 1069-1078. doi: 10.12677/AP.2020.108127
- 鲁澳芬 (2020). 社会善念研究综述. *心理学进展*, 10(8), 1195-1200. doi: 10.12677/AP.2020.108140
- 杨翠.(2020). *女大学生感知社会善念对合作表现及脑间活动同步的影响*. (硕士), 武汉体育学院.
- 向凌灏.(2020). *社会善念感知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影响研究*. (硕士), 电子科技大学.
- 陈雅姣.(2019). *感知社会正念和心理距离对大学生信任修复的影响*. (硕士), 上海师范大学.
-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 刘耀中.(2018a). 信任还是设防?互动博弈中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 *心理科学*, 41(02), 390-396.
- 窦凯, 刘耀中, 王玉洁, & 聂衍刚.(2018b). “乐”于合作: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 *心理学报*, 50(01), 101-114.
- 窦凯.(2016). *感知社会正念: 有效促进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 (博士), 暨南大学.
- 包金金.(2019). *小学儿童互动公平认知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善念的影响*. (硕士), 苏州大学.
- 严益霞.(2019). *初中生社会善念行为的发展及其对公平行为的影响*. (硕士), 苏州大学

- 陈琪, 陈冰, 刘来, 赵玉芳, & 吴宗辉. (2020). 催产素对社会善念的提升作用. *心理科学*, 43(03), 712-717.
- 仇不凡. (2019). *藏族学生的社会善念及合作行为研究*. (硕士), 河北师范大学.
- 刘嘉. (2018). *社会阶层对社会正念的影响: 合作/竞争的作用*. (硕士), 宁夏大学.
- 陈满琪. (2016). 社会正念及其与道德关系的研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01), 151-164.
- Mischkowski, D., Thielmann, I., & Glöckner, A. (2018). Think it through before making a choice? Processing mode does not influence social mindful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4, 85-97. doi: 10.1016/j.jesp.2017.09.001

**意见 6:** (4) 再者, 在已有的中国人的本土人格研究中至少存在一些在词义上与社会善念相关的构念, 比如和谐性、自我防御(阿Q精神)、人情、面子等等。因此, 建议作者在相关的文献检索与分析方面也要下点功夫。

**回应:** 非常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专业丰富的建议。研究者重新检索和梳理了关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本土化研究, 首先更加明确本土化人格研究的重要性(杨国枢, 2004; 杨国枢, 俞宗火, 2008), 同时结合社会善念人际交往情境的关注, 发现关于人际互动情境部分, 在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量表的“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因素中, 包括人情、和谐性、面子等分量表(王登峰, 崔红, 2005)。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丰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 体现了本土化人格构念, 显示出中国人社会交往模式及其文化内涵, 如讲究往来人情、维持表面和谐、有里有面等。人际关系性因子可看作是一个传统性因子(张建新, 周明洁, 2006)。因此, 在社会善念的人际特质方面需要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因子。

#### 【参考文献】

- 杨国枢, 俞宗火.(2008).本土人格研究:中国的情况.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01),192-222
- 杨国枢.(2004).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登峰,崔红.(2005).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探索——中国人个性量表与中国人人格量表的交互验证.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1(05),5-16.
- 张建新, 周明洁.(2006).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心理科学进展*, 14(04),574-585.

#### 意见 7:

(5) 关于研究问题, 社会善念的内涵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作者从人格特质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P4),但前言部分只能说明社会善念受到某些特定的人格特质的影响, 当个体具有某些特定品质(例如宜人性, 共情等)时, 更容易表现出社会善念。然而, 这并不能推论社会善念是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在社会情境中的表现。个体的很多良好品质可能与社会善念并不相关。建议作者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同时, 建议作者提供更准确的社会善念内涵表述。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点评。针对以上问题, 文章做了三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 因为社会善念的概念比较新, 且因为翻译的原因存在争议, 所以在前言里面总结内涵有些突兀, 此部分改为 1.1 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 主要是对当前的概念进行整合, 提出我们的概念——社会善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情境中感知他人状态、愿意尊重对方选择并做出让渡权利行动的善意, 其具有稳定的人格特质的一面。

第二, 对于个体良好品质与社会善念的关系, 确实存在专家所言, 不能推断社会善念是良好品质在人际环境中的表现, 只能说具有社会善念的个体, 其内在的心理结构有良好的品质, 这正是研究所要探讨的, 故将后面的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论述, 改为 1.2 社会善念与人格变量的相关研究, 以初步探讨社会善念与良好品质的关系。

第三, 关于社会善念的内涵, 需要在进行心理结构的探索和验证之后, 对前言概念进行丰富整合, 最终得到。在最终的结论里, 结合研究结果和前期整合概念, 我们提出社会善念

的内涵是——反映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个人特质(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和人际特质(积极开放、包容理解)在感知他人的技能和尊重对方、让渡选择权意愿上的表达。

**意见 8:** (6) 1.1 节中作者对社会善念内涵的进行了界定——“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反映在人际互动情境中能够感知他人状态, 愿意尊重对方选择、做出让渡权利行动的善意”。这里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比如, 良好品质指代什么? 这是统帅全文的概念, 但是存在严重的语法错误。比如, “能够感知他人状态”的主语是什么? 如此等等, 建议作者在基本的语言表达上多下下功夫。此外, 意愿属于能力的范畴吗? 能力一般被定义为顺利完成某一活动所必需的主观条件。技能是能力结构的组成成分, 是能力的基础。但意愿是每个人内心对待事物的愿望、心愿。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细致的建议。研究将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为, 个体在人际互动情境中, 能够感知他人状态, 同时愿意尊重对方选择, 并作出让渡权利行为的善意。具体的内涵通过结构的探索和验证, 最终丰富为, 反映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个人特质(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和人际特质(积极开放、包容理解)在感知他人的技能和尊重对方、让渡选择权意愿上的表达。关于意愿和技能的概念, 主要参考提出者的概念界定——“个体做出顾及他人的选择, 这种选择包含了善意关注他人控制结果的技能 (skill) 和意愿 (will)”(Van Doesum et al., 2013, p. 86)。技能主要指能够感知他人状态的技能, 而意愿指的是愿意尊重对方、让渡选择权的意愿。

#### 【参考文献】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103. doi: 10.1037/a0032540

**意见 9:** (7) 1.2 节“同时……”一段同样存在严重的语法错误, 读起来佶屈聱牙。而且这么一大段话, 竟然只有一个句号。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辛苦的审读。此部分重新进行了调整, 并修改了文字语法。

**意见 10:** (8) 作者需要对 HEXACO 进行基本的说明。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 考虑到研究方法部分的精炼, 已在前言部分增加了对 HEXACO 的解释。

**意见 11:** 2.研究一的结构混乱。研究过程、被试、工具以及结果堆放在一起。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 笔者将研究一和其他研究的结构相统一, 分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被试、研究程序及工具)、研究结果

**意见 12:** 3.研究二: (1) 作者把量表和问卷两个词混用。作者说采用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请问因素分析是什么? 难道可以跟信效度并列吗? 信度具体指什么? 效度又如何?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点评。基于量表和问卷在严格程度、规范程度、标准化程度等方面的区别, 研究仅将开放调查作为问卷的表述, 其他词汇评定、自陈描述等都作为量表进行了统一。

在研究目的中表述的“采用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也不够严格, 因素分析是作为结构探索和验证的一种方法, 信效度是对量表的科学验证, 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故此句话删除。

意见 13: (3)关于主成分分析法,统计学者认为不适合应用于数据结构分析。例如, Widaman K F. (1990). Bias in pattern loadings represented by common factor analysis and component analysi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5 (1) : 89~95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专业建议。统计学者认为公共因素分析 (common factor analysis) 和成分分析 (component analysis) 最重要的区别是: 是否在模型内估计唯一的方差 (widaman, 1990)。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是采用降维思想, 从多指标中确定有最大贡献的因素, 仅采用该方法不适合数据结构分析。但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经典组合——主成分分析和最优斜交转轴, 通过在正交因素模型下的因素载荷矩阵, 对其进行斜交变换, 使因素结构更为简洁, 利于解释 (刘红云,2019)。同时, 我们也尝试采用主轴因素法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结合最优斜交转轴, 结果探索的因素结构不易解释, 故依然采用之前的方法。

【参考文献】

刘红云 编著. (2019). 高级心理统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意见 14: (4) 表一中需要注明小于.40 的因素载荷已经删除。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建议。已在表 1 社会善念词汇量表的三因素结构表和表 2 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的四因素结构表下面进行了补充——因素负荷值低于 0.40 者没有列出。

意见 15: (5) 研究二对三因素模型的命名牵强, 缺乏理论和逻辑的说明。比如, 通情达理的、有礼貌的是否也属于对待他人的; 积极主动的, 有信心的等是否属于优良的个人特征。对待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包含他人吗? 如果不包含, 那这个世界是什么? 如果包含, 为啥要列为两个因素。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中肯的意见。研究二中对三因素的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和验证, 鉴于 S1 因素和 S3 因素反映的更多是个体特质, 故合并成一个维度, 形成双因素模型 1; 鉴于 S2 因素和 S3 因素侧重于对他人有直接影响的特质, 故合并成一个维度, 形成双因素模型 2。对这些模型进行了最优模型竞争分析

	$\chi^2$	Df	$\chi^2/df$	RMR	GFI	IFI	TLI	CFI	RMSEA
单因素模型	593.04	135	4.39	0.06	0.80	0.82	0.79	0.81	0.11
双因素模型 1	394.04	134	2.94	0.04	0.87	0.89	0.88	0.89	0.08
双因素模型 2	541.37	134	4.04	0.05	0.81	0.83	0.81	0.83	0.10
三因素模型	379.08	132	2.87	0.04	0.90	0.93	0.91	0.93	0.06

结果表明, 这两个模型拟合都不是很好。故最终还是采用了三因素的结果, 而且采纳专家意见, 不从个人、他人和世界的角度进行归纳, 而仅以各因素所包含的内容来进行解读, 且将因素三改为“积极开放”

对三因素模型所包含的词汇和内涵进行分析命名: S1 因素包括诚信的、谦恭的、善良的、通情达理的、有礼貌的、有责任感的、尊重的, 描述了个体优良的个人特征, 更侧重于善良尊重的内涵, 命名为“善良尊重”。S2 因素是包括包容的、共情的、换位思考的、乐于助人的、礼让的、利他的, 描述了对待他人的行为表现, 命名为“包容理解”。S3 因素包括积极主动的、乐观开朗的、外向的、胸襟开阔的、有信心心的, 描述了个体乐观向上、对外开放的特质, 命名为“积极开放”。

意见 16: 4.研究三中, 将乐观豁达指称“人际特质”存在词义上的混淆。查现代汉语词典, 乐

观指“精神愉快，对事物的发展充满信心”，豁达指“性格开朗”。

**回应：**非常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对乐观豁达的命名，我们专门请教了在汉语言文化方面有造诣的专家，两者有较大的词义混淆。但是从研究二的词汇内容和研究三的自我内容，都不太好精准用词汇进行概括，最终结合人格的高阶因子证据和关于人际特质的概念界定，将其修改为“积极开放”。

从人格的高阶因子证据来讲，代表的是可塑性（Plasticity），是探索和积极行为的基础，指向外向性或经验的开放性(DeYoung, 2006)，是面向外部的。从人际特质的概念界定来讲，其是由周围环境定义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人感知他人的动机倾向，从而影响行动意愿和动力(Ansell & Pincus, 2004; Brown, Poole, & Rodgers, 2004; Gaines, 1996; Gurtman, 2009)。题目所表达的对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同事或同学的开放性，体现在人际交往的情境中，故本部分界定为“人际特质”具有双重含义。

#### 【参考文献】

- DeYoung, C. G. (2006). Higher-order factors of the Big Five in a multi-informant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6), 1138-1151. doi: 10.1037/0022-3514.91.6.1138
- Ansell, E. B., & Pincus, A. L. (2004).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 Examination Using the Structural Summary Method for Circumplex Data.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2), 167-201. doi: 10.1207/s15327906mbr3902\_3
- Brown, H. G., Poole, M. S., & Rodgers, T. L. (2004). Interpersonal Traits, Complementarity, and Trust in Virtual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4), 115-138. doi: 10.1080/07421222.2004.11045785
- Gaines, S. O. (1996).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and Gender-Role Compliance on Interpersonal Resource Exchange among Dating and Engaged/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2), 241-261. doi: 10.1177/0265407596132005
- Gurtman, M. B. (2009). Exploring Personality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4), 601-619. doi: 10.1111/j.1751-9004.2009.00172.x

#### 意见 17：5.其他：

(1) 关于研究意义。探究中国文化下的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和内涵，对后续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但作者对理论意义的阐述较少，作为本研究的创新性贡献，建议做进一步补充，凸显本研究的理论价值。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建议。从理论意义上进行了补充，同时增加社会善念和中国文化发展部分的阐述，以期能切合文章主题，从中国文化的纵深发展的角度，探究社会善念内涵和结构的意义。

**意见 18：**(3) 关于性别差异问题。性别是人格研究的重要变量。作者是否需要考虑性别差异、性别平衡问题（研究 2 样本一：男性 170 名，女性 181 名，样本二：男性 223 名，女性 84 名；研究 3 样本一：男性 239 名，女性 138 名，样本二：男性 164 名，女性 56 名）。

**回应：**谢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性别确实是人格研究的重要变量，有研究对 1958-1992 年的文献中关于人格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自信，女性在外向性、焦虑等方面高于男性。但是在社交焦虑、冲动性、积极性、反思性、秩序性等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Feingold, 1994)。同时，在亲社会人格特质方面，也存在一定争议。有研究者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究与情境相关的性别亲社会差异，对近 50 年抽样出的 272 项研究，从社会文化和进化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总体平均效应大小在统计学上无差异 ( $d = -0.05$ )，



这表明男性和女性的亲社会行为在总的环境情境下没有差异(Balliet, Li, Macfarlan, & Van Vugt, 2011)

同时结合 Van Doesum 和 窦凯的研究, 性别对实验效果没有干扰, 同时研究者也在后续进行过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结果显示不论是用传统社会善念测量, 还是采用中国人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社会善念均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故抽样中没有考虑性别平衡问题。

#### 【参考文献】

Feingold, A. (1994).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429-456. doi: 10.1037/0033-2909.116.3.429

Balliet, D., Li, N. P., Macfarlan, S. J., & Van Vugt, M. (2011). Sex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social dilemma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6), 881. doi: 10.1037/a0025354

**意见 19:** (4) 关于文章细节问题如病句、格式等。例如, “国内最初将其应用于感知互动层面的研究(窦凯, 2016), 而对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社会善念的内涵本质探讨有待深入”; 正文中三人以上作者的引用(P7), 参考文献的格式(P20), 正文中的括号存在不同字体, 正文跳行(P10)等问题。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仔细审阅。已从头到尾通读修改了文字表述, 并基于心理学报的格式要求, 通篇修改了不符合要求的格式。

**意见 20:** (5) 表、图中小数数位的规范问题。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已将正文、图、表中所有小数位数全部保留 2 位小数。

**意见 21:** (6) 英文摘要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英文表达。比如,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ollectivism culture,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mindfulnes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a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一句的主谓结构使用错误。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审读, 再次请国外的学者朋友对英文摘要进行了通读修改。

---

## 第二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研究的问题很有意义, 对中国人善念结构加以建构, 并编制出了相应的测量工具, 是一个很好的本土心理学探索。但是文章在写作上还需要加以简化和完善,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 以下对文章写作进行了精简和完善, 感谢您的中肯建议。

**意见 2:** 论文前面引言部分不够简练, 和对概念的解释有重叠, 显得多余啰嗦, 引言部分应该阐明你研究的问题及其简单的研究思路, 相关的概念说明应该放在概念里说。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专业耐心的意见。论文将引言部分进行了高度凝练, 并将有关概念的解释放到了“概念界定”部分, 突出论文研究的问题及简单的研究思路。

**意见 3:** 论文构建了两个工具, 并且两个工具还不一致, 尽管作者想通过多种统计技能让二

者统一,但还是无法做到。这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二者构建的基础有差异,词表的基础广,而测量问卷的基础是已经成型的词表,丧失了很多的信息。所以,我建议作者只选用一个形容词表就够了,没必要在一个研究中把两个都包括进来,因为词表的结构是从实践中来的,所以更符合。后面的问卷可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完善。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中肯的建议。经论文作者们集中讨论,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保留这两部分研究。原因有三。第一,研究3的自陈量表编制的基础不仅仅是研究2所成型的词表,还有研究1开放调查所收集的被试关于高社会善念者的情景描述,这部分信息补充了词表的局限。第二,研究2词表结构的探索,因词汇高度抽象的原因,使“谦和恭逊”这个很重要的维度没有凸显出来,而隐藏在“善良尊重”的词表中。第三,研究3充分体现了社会善念作为一种人际特质所独有的情境性,而情境描述的表达,使“谦和恭逊”这个维度得到了很好的统计验证,再进一步验证其他三个维度的同时,对社会善念的完整结构有了更有说服力的补充。综上所述,笔者依然保留了研究3,但同时也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富有远见的意见,在将来的研究中,将继续对研究3所编制的自陈量表进行大规模施测验证和修订。

**意见4:**文章中探讨的是中国人的善念,但中国人的特点不只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人际关系取向等都可能和善念表达有关,比如中国人对不同人的善念表达就不一样,在不同的情境中的表达也不一样,所以测量也应该考虑情境特性和关系特性。也应该分析一下中国人的善念和国外人的有什么不同。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点评。论文聚焦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必须深入分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背景所引起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社会善念的不同。因此,笔者近期阅读了一些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类型的书籍文献,试图梳理哪些文化特点会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

首先,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视角是个切入点。结合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 (Higgins, 1997), 对此部分的观点进行修正如下:

Van Doosum 等(2013)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防御聚焦(prevention focus), 不给别人添麻烦(Hashimoto & Yamagishi, 2011), 保持现有的好名声, 预防自私选择损害个人形象, 即中国文化下典型的“面子”问题。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下, 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促进聚焦(promotion focus) (Higgins, 1998; Lockwood, Jordan, & Kunda, 2002), 为他人考虑的选择可以使其获得积极的认可或自我奖励。

中国文化的本质毫无疑问是集体主义的(杨国枢, 俞宗火, 2008), 更具体地说是垂直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Triandis, 1995)。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理论是当代文化心理学领域广为应用的(蔡华俭等, 2020), 同时, 两者也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维度。但中西文化差异包括很多维度, 不能简单地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差异来解释。Hofstede(2001)的文化差异研究将其分为个体/集体主义、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男/女性化四个维度。梁漱溟先生(2010)从唯识学的知识论(现量、比量、非量)进行东西方文化思想的解析, 从不同的路径解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然后, 在此基础上, 研究尝试从中西方文化的宏大视角剖析文化差异对社会善念表达的影响。阐述如下:

纵观中西方历史长河, 中国从最原始的农耕时代开始, 经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家争鸣, 儒家思想占据上风, 后经佛教、理学、心学, 一直到新文化运动, 思潮涌动(常乃惠, 2019), 但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思想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善念表达, 例如传统的长幼尊卑、人情面子、中庸调和等, 会使个体在表达社会善念的时候, 更多考虑他人感受, 避免因不照顾他人选择而丢了面子, 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再来分析西方文化, 以“向前的路向”征服自然、追求科学和民主(梁漱溟, 2010), 经历希腊文明,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时期，开展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直至卢梭、康德、杜威等现代哲学思潮兴起（罗素，2016），使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根深蒂固。随着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更加促进了西方人们追求自由，凸显个性的价值取向，故而西方文化所浇灌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个体对社会善念的表达，更多会遵从本性，不会过多考虑面子问题，但为了维持与他人的互动合作，会积极主动地让出选择。

综上所述，只是笔者阅读文献后，结合社会善念的概念发展，粗浅的理解和分析。面对东西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社会善念所特有的心理结构探索，还需进一步寻迹和验证。

#### 【参考文献】

- 梁漱溟. (2010).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商务印书馆.
- 罗素. (2016). *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 常乃惠. (2019). *中国思想小史*. 哈尔滨出版社.
- 黄梓航, 敬一鸣, 喻丰, 古若雷, 周欣悦, 张建新. (2018). 个人主义上升,集体主义式微?——全球文化变迁与民众心理变化. *心理科学进展*, 026(011), 2068-2080.
- 翟石磊, 李川. (2010). 身份认知与文化维度——中美文化背景下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对比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02), 37-43.

**意见 5:** 总之，我感觉这篇文章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完成都不错，建议作者认真修改后发表。

**回应:** 非常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

.....

#### 审稿人 4 意见:

**意见 1:** 论文有价值，总体来说不错，但是小错误不少，需要作者认真修改。举例如下（特别强调：并非未举例部分就没有问题，只是问题较多，难以一一举例）。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同时也对论文的小错误给专家带来的困扰表示歉意。以下已对专家所提宝贵意见进行了全力修改，同时也对全文所有部分进行了仔细通读审校，修改了除以下部分外的其他小错误，感谢专家的热心指点。

**意见 2:** 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与内涵”。一个概念（如“社会善念”）的“内涵”通常是包括该概念所指称的现象的“结构”的，作者自己在“5.3 社会善念的内涵及意义”中也是把结构放入“内涵”之下的，因此这样拟定标题是不恰当的。该论文的核心工作是建构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因此建议将题目改为“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意见。结合论文的整体修改，研究所建构的社会善念“心理结构”不足以支撑其“内涵”的丰富性，且论文的重点在于建构中国人的社会善念心理结构，因此同意专家意见，将题目修改为“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意见 3:** 作者将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划定为个人特质是不恰当的，这些其实都是人际特质，特别是谦和恭逊是典型的人际特质。另外，作者在“5.1.2 二阶结构”中对人际特质这个二阶因素进行界定，但却未对“个人特质”进行界定，请给出界定，并论证该界定和划分的合理性。人际特质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是“Wiggins 的人际环状模型”，但是作者未引用，建议作者再认真查阅文献，对人际特质进行更恰当地界定，目前的界定不太清晰。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精辟点评。经专家指点，在阅读了很多有关人际特质的相关文献后，同意专家的意见，在作者们反复研讨琢磨下，充分认识到社会善念作为稳定的人格特质，隶属于人际特质的范畴，而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和外倾性是最经典最基本的人际特质，可以

涵盖大多数的人际特质，同时结合两个高阶维度，重新将其界定为宜人特质（包括善良尊重和谦和恭逊）、外倾特质（包括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在此定位的基础上，论文对人际特质进行了充分的概念界定，并将环形模型纳入人际特质的整合分析中，尝试将来探索社会善念作为一种人际特质，其除了具有二阶四因子结构外，是否也可以具有连续无缝隙的结构，作为因素结构的补充。具体阐述如下：

Wiggins (1979)指出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类别就是人际特质(interpersonal traits)。有很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和实证研究，一般认为人际特质是由周围环境定义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人感知他人的动机倾向，从而影响行动意愿和行为动力(Ansell & Pincus, 2004; Brown, Poole, & Rodgers, 2004; Gaines, 1996; Gurtman, 2009; 赵菊, 佐斌, 2013)。这一解释很好地契合了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故此研究认为社会善念隶属于人际特质。

同时，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和外倾性被认为是最基本最经典的人际特质，可涵盖大多数人际特质(Mccrae & Costa, 1989)。依据人格的两高阶因素(Two higher-order factors of personality)，有研究者在大五人格中发现了两个不相关的高阶因子的证据(DeYoung, 2006)，将其标记为稳定性(Stability)和可塑性(Plasticity)。前者是指情绪和行为的稳定调节基础，指向情绪稳定、宜人或尽责，而后者是探索和积极行为的基础，指向外向性或经验的开放性。故此，研究所确定的二阶四因素结构模型中，将善良尊重和谦和恭逊归类为宜人特质，将积极开放和包容理解归类为外倾特质。

此外，环形模型(circumplex model)作为人格因素模型的互补模型(Trapnell & Wiggins, 1990)，为人际特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合的视角(黄飞等, 2010)。Wiggins(1979, 2003)开发的人际特质测量工从“爱-恨”、“主导-顺从”的维度进行划分。将来研究可将社会善念的因素结构整合到环形模型中，从爱与接受的角度对其人际特质进行无缝解读。

#### 【参考文献】

- Wiggins, J. S. (1979). A psychological taxonomy of trait-descriptive terms: The interperson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395-412.
- Mccrae, R. R., & Costa, P. T. . (1989).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wiggins's circumplex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4), 586-595.
- 黄飞, 李育辉, 张建新, 朱浩亮.(2010).环形模型:整合人格研究的一种取向. *心理科学进展*(01),132-143.
- Conte, H. R., & Plutchik, R. (1981). A circumplex model for interpersonal trai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0, 701-711.
- 赵菊, 佐斌. (2013).人际关系互动中人际特质的环形模型探索. *心理学探新*(01),57-62.
- Wiggins, J. S. (2003). *Paradigms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意见 4:** 建议作者在摘要中清晰地报告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的研究结果，因为这是本文实证研究部分的核心和主题内容，目前的摘要其实也是提到了的，但是不够突出。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细致的点评。论文在摘要中重点突出了中国人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的研究结果，并结合专家意见，将结果描述修改为“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典型的人际特质，是包括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的二阶四因素结构。宜人特质包括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外倾特质包容理解、积极开放。”

**意见 5:** 表述不规范。例如，“1 引言”第一段写道“结合心理学报编委所提出的专业建议，国内学者最初发表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的论文中”，“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都应该加书名号。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已将“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加书名号进行规范。

意见 6：“1 引言”第一段主要解释了“社会善念”的翻译，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写得有点啰嗦了，建议精简，用 3 句话介绍一下即可。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点评。此部分对“社会善念”的翻译介绍进行如下：

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由荷兰自由大学研究团队最先提出(Van Doesum, Van Lange, & Van Lange, 2013)，最初直译为社会正念，但研究表明“社会正念”与正念注意意识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所测的正念水平没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同时 Van Lange 和 Van Doesum(2015)也提出低的“社会正念”相当于“社会敌意(social hostility)”，而社会敌意对应的名词应该是社会善念，而非社会正念。同时，结合《心理学报》编委所提出的专业建议，国内学者将“社会正念”改为“社会善念”(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2018a；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耀中，2018b)。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以及正念所具有的佛学教义，研究认为“社会善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更具中国特色。

意见 7：建议给出“笔选择范式”的英文，并对该范式的具体操作，为什么能用于测量社会善念做简单介绍。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细致的建议。文章将“笔选择范式”的英文、操作，以及为何用于社会善念，及社会善念测量范式进行了简要说明，如下：

社会善念的测量方式源于笔选择范式(Pen-choice paradigm)(Kim & Markus, 1999; Hashimoto, Li, & Yamagishi, 2011)，该范式要求个体在两种颜色的五支笔中选择一支，例如一支红色笔和四支绿色笔，颜色是区分的唯一标准，对不同色笔的选择是人们战略选择的结果。Van Doesum 等(2013)受此范式的启发，开发物品选择游戏作为社会善念测量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将选择非唯一物品的行为视为社会善念。

意见 8：“1 引言”第二段写道“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处事原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Hashimoto & Yamagishi, 2011)，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防御聚焦(prevention focus)，即保持现有的好名声，预防自私选择损害个人形象，即中国文化下典型的“面子”问题”。但是作者没有给出该观点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对于该观点，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利他选择也是包括促进聚焦(promotion focus)，而且难以证明防御聚焦(prevention focus)就一定多于促进聚焦(promotion focus)。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意见。关于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所引起的社会善念表达差异，论文对此部分进行了修改。首先，笔者又查阅了一些关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调节定向（聚焦）差异上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个体关注对他人的责任义务，具有高水平的预防定向（聚焦）(Lalwani, Shrum, & Chiu, 2009)；而个体主义文化个体关注个人成就和远远，有高水平的促进定向（聚焦）(Elliot, Chirkov, & Sheldon, 2001)。然后，论文以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差异为切入点，结合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进行修正阐述，如下：

Van Doesum 等(2013)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防御定向(prevention focus)，不给人添麻烦(Hashimoto & Yamagishi, 2011)，保持现有的好名声，预防自私选择损害个人形象，即中国文化下典型的“面子”问题。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 (Higgins, 1998; Lockwood, Jordan, & Kunda, 2002)，为他人考虑的选择可以使其获得积极的认可或自我奖励。

中国文化的本质毫无疑问是集体主义的(杨国枢，俞宗火，2008)，更具体地说是垂直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Triandis, 1995)。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理论是当代文化心理学领域广为应用的(蔡华俭等，2020)，同时，两者也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维度。但中西文化差异包括

很多维度，不能简单地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差异来解释。Hofstede(2001)的文化差异研究将其分为个体/集体主义、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男/女性化四个维度。梁漱溟先生(2010)从唯识学的知识论（现量、比量、非量）进行东西方文化思想的解析，从不同的路径解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 【参考文献】

- Elliot, A. J. , Chirkov, V. I. , & Sheldon, K. K. M. . (2001).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voidance (relative to approach) personal goal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6), 505-510.
- Lalwani, A. K. , Shrum, L. J. , & Chiu, C. Y. . (2009). Motivated response styles: the role of cultural values, regulatory focus,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6(4), 870-82.
- Higgins, E. T. (1997).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1280-1300.

**意见 9:**“1 引言”第二段写道“文化差异更复杂，提出者预计其他个人或国家层面的变量将提供更好的解释，全球关于社会善念的跨文化研究也正在编写中(Van Doesum, 2016)”。这句话存在多个语法错误或问题。例如“跨文化研究也正在编写中”的表述不当，“研究”不应该是“编写”，编写的可以是研究计划，但不是研究本身。又如，“提出者”是指谁，指称不够明确。还有，句子开头的“文化差异更复杂”与该句子后面内容的逻辑关系不明确，表述不清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点评。论文将此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整合，凝练到关于社会善念利他选择受文化因素影响的部分，阐述如下：

前述社会善念可操作性的概念界定表明，它的利他选择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互动模式，会影响个体对利他选择的不同推断，进而影响其社会善念的表达(任彧, 2017)。目前，全球关于社会善念的跨文化研究正在进行，以期待可以在不同国家层面得到更好的解释(Van Doesum, 2016)。因此进行社会善念的跨文化研究非常有必要。

**意见 10:**作者在回复第一位审稿人意见的时候写道“对于个体良好品质与社会善念的关系，确实存在专家所言，不能推断社会善念是良好品质在人际环境中的表现，只能说具有社会善念的个体，其内在的心理结构有良好的品质”。第一，前半段的回应“对于个体良好品质与社会善念的关系，确实存在专家所言，不能推断社会善念是良好品质在人际环境中的表现”我同意，但是作者在文中并未做针对性修改。例如在“1.1 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第二段作者写道“具有宜人性、共情、利他等良好品质的个体，更容易主动觉察对方处境，从而做出让渡选择的行为，获得他人信任和好感，增进人际关系(Van Doesum et al., 2019)。由此推测，个体在人际互动情境中的感知技能和意愿表达，体现了其内在稳定的人格特质”。显然，作者还是在用“个体良好品质与社会善念的关系”来推断社会善念是人格特质。第二，后半段的回应“只能说具有社会善念的个体，其内在的心理结构有良好的品质”，我不认可。我认为不能做出这样的推论。具有良好品质的个体具有一些社会善念相关的积极表现不足以证明“具有社会善念的个体，其内在的心理结构有良好的品质”。

**回应:**非常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精准点评。经过本轮修改，笔者越来越体会到高社会善念个体具有良好品质，并不代表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就是这些良好品质，两者有相关，但不是包含关系。重新梳理此部分内容，增加社会善念作为一种稳定人格特质的证据，如下：

有研究者将其概念化为反映动机状态以及认知和影响的基本取向，它可由关系或情境变量激活，也可作为个性变量位于个体内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特质”(窦凯等, 2017: p. 1108)。实证研究也表明了社会善念既有类状态的特征，又有类特质的特征(Mischkowski, Thielmann, & Glöckner, 2018)。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善念的外在表现恰恰是内心稳定的人格特质所决定。

在经过作者们多次讨论修改后，将此部分大多内容删除，保留一部分关于社会善念与良好品质（人格变量）的相关，用于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的讨论部分。不再将具有良好品质个体具有社会善念表达，作为“社会善念个体心理结构有良好品质”的依据。再次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使笔者对社会善念有了更清晰的剖析。

**意见 11：**“1.2 社会善念与人格变量的相关研究”部分与论文主题的关系不大，建议删除。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意见。经作者集中讨论，非常认同专家意见，“社会善念与人格变量的相关研究”不是该论文的重点，不能将相关人格变量与社会善念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就认定社会善念具有这些人格特质，这一逻辑错误需要纠正。因此也将此部分删除，仅将部分内容作为后续讨论使用。

**意见 12：**在“1.3 社会善念结构的本土化探索”中作者写道“关于人际互动情境，在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的“人际关系性”因素，包括人情、和谐性、面子等分量表(王登峰, 崔红, 2005)”。该句开头的“关于人际互动情境”与后面的内容缺乏逻辑关系，令人费解。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意见。关于人际关系性因素，是中国人人格的典型重要特点，作为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的本土化探索，这部分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论文对此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梳理，此部分完整阐述如下：

首先，本土化心理学非常有必要(杨国枢, 2004)，本土化人格建构更加重要。中国人格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本国文化，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到生活实践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关人格心理学的问题(黄希庭, 2004)。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乃至人格特质中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特殊性(张建新, 周明洁, 2006)。

其次，结合社会善念的人际特点，需要考虑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特色性，即人际关系性。梁漱溟先生指出观察文化的方法来源于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是基于血缘和家庭所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在通过关系和集体来界定自我的中国文化氛围下，人际取向的人格理论是研究中国人人格特质的重要基石(黄飞, 李育辉, 张建新, 朱浩亮, 2010)。王登峰和崔红(2005)开发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其中包括了中国人所特有的人格维度——“人际关系性”，即人情、和谐性、面子等。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丰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体现了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社会交往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维持表面和谐、有里有面等。这也充分说明了人际关系性因素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格特质的传统因素(张建新, 周明洁, 2006)。

**意见 13：**“所有的人格特质都会被编码到自然语言中去”是奥尔波特提出的著名观点，建议对奥尔波特的文献进行引用，或者指明是转引。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意见，将此部分进行修改如下：

Allport 和 Odbert(1936)指出“所有的人格特质都会被编码到自然语言中去”。

#### 【参考文献】

Allport, G. W., & Odbert, H. S. (1936). Trait-names: A psycho-lexical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47(211), 1-171. doi: 10.1037/h0093360

**意见 14：**“1.3 社会善念结构的本土化探索”部分很有必要，建议作者给出明确的关于中国人的社会善念的结构与西方人的到底会有哪些不同的具体的可检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假设。目前这个部分的阐述有点空泛，缺乏实质性内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点评。论文聚焦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必须深入分析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背景所引起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社会善念的不同。因此，笔者近期阅读了一些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类型的书籍文献，试图梳理哪些文化特点会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

论文尝试从中西方文化的宏大视角剖析文化差异对社会善念表达的影响。阐述如下：

纵观中西方历史长河，中国从最原始的农耕时代开始，经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家争鸣，儒家思想占据上风，后经佛教、理学、心学，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思潮涌动（常乃惠, 2019），但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思想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善念表达，例如传统的长幼尊卑、人情面子、中庸调和等，会使个体在表达社会善念的时候，更多考虑他人感受，避免因不照顾他人选择而丢了面子，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再来分析西方文化，以“向前的路向”征服自然、追求科学和民主（梁漱溟, 2010），经历希腊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展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直至卢梭、康德、杜威等现代哲学思潮兴起（罗素, 2016），使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根深蒂固。随着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更加促进了西方人们追求自由，凸显个性的价值取向，故而西方文化所浇灌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个体对社会善念的表达，更多会遵从本性，不会过多考虑面子问题，但为了维持与他人的互动合作，会积极主动地让出选择。

以上阐述为笔者阅读文献后，结合社会善念的概念发展，粗浅的理解和分析。面对东西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社会善念所特有的心理结构探索，还需进一步寻迹和验证。

#### 【参考文献】

梁漱溟. (2010).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商务印书馆.

罗素. (2016). *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常乃惠. (2019). *中国思想小史*. 哈尔滨出版社.

**意见 15：**作者在对社会善念进行界定的时候非常强调“人际互动情境”，但是人格特质词是缺乏“情境性”的一种研究材料，作者在“5.1.1 一阶结构”中也写道“因人格词汇的抽象性”，因此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方法的选用不一致。我认为过分强调“人际互动情境”是没有必要的，否则作者就需要对这种不一致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论证。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在通篇修改论文之后，研究将社会善念定位为一种稳定的人际特质，不再过分强调“人际互动情境”，而将其视为稳定人格特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引起个体能够感知他人状态、尊重并让渡选择权利的善意行为。

**意见 16：**在“图 5 社会善念的内涵结构图”中作者将“谦和恭逊”和“包容理解”划分为“技能”，这很难让读者认同。中国文化强调的“谦和恭逊”和“包容理解”绝对不仅仅是人际技能，而是基本的人格品质。此外，作者对该种划分也未做充分的论证，请作者给出划分的依据。建议作者结合中国文化去合理地重构社会善念的定义，而不是用获得的结果去硬套之前的界定。

**回应：**非常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笔者最初试图将国外学者对于社会善念的内涵界定（skill 和 will），与论文研究的社会善念心理结构（二阶四因素）进行整合建构。但在专家的指点分析下，感觉将技能和意愿强硬地与四个维度挂钩，欠缺合理性。故笔者完全接受专家意见，结合中国文化，重新解构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通过分析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下，传统文化思想所产生的长幼尊卑、谦虚谨慎、人情面子、和谐中庸、知行合一一致良知等等对于中国人社会善念表达的影响，建构中国人社会善念二阶四因素结构的合理性。

---



### 第三轮

#### 审稿人 4 意见:

**意见 1:** 论文经过修改后,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升,基本达到了发表要求,建议发表。但是论文中仍然存在不少语言表达上的问题,建议作者请写作水平高的同仁或相关专业人士来帮助好好规范语言表达。例如,在不到 200 字的摘要中就存在多处错误,正文中的类似问题也较多。以下具体举几例。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和认可。已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逐条修改,文章所有作者进行了通读修改,并请两位写作水平比较高的同仁帮助全文通读,规范语言表达,详见文章标蓝部分。

**意见 2:** “摘要”中的“18 词”的表述不够规范,建议改为“18 个人格特质词”。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意见。已将“18 词”改为“18 个人格特质词”。

**意见 3:** “摘要”中写道“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典型的人际特质,是包括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的二阶四因素结构”。首先该句没有主语。其次,社会善念是二阶四因素结构的表述也不太恰当。第三,“摘要”中的“外倾特质包容理解、积极开放”漏掉了“包括”一词。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意见。已将词句修改为“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的人际特质,二阶是指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四因素分别是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

**意见 4:**“1 引言”第一句“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由荷兰自由大学研究团队最先提出(Van Doesum, Van Lange, & Van Lange, 2013),最初直译为社会正念,但研究表明‘社会正念’与正念注意意识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所测的正念水平没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同时 Van Lange 和 Van Doesum(2015)也提出低的‘社会正念’相当于‘社会敌意(social hostility)’,而社会敌意对应的名词应该是社会善念,而非社会正念”的内容较多,句子较长,建议改为 2-3 句。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将此长句,修改为 3 句,如下:

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由荷兰自由大学研究团队最先提出(Van Doesum, Van Lange, & Van Lange, 2013),最初被直译为社会正念。研究表明“社会正念”与正念注意意识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所测的正念水平没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Van Lange 和 Van Doesum(2015)也提出低的“社会正念”相当于“社会敌意(social hostility)”,而社会敌意对应的名词应该是社会善念,而非社会正念。

**意见 5:**“1 引言”第二句写道“同时,结合《心理学报》编委所提出的专业建议,国内学者将“社会正念”改为“社会善念”(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2018a;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耀中,2018b)”,但是所引用的论文中还有在《心理科学》上发表的。建议直接写已有学者将 social mindfulness 的翻译改为了“社会善念”。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将此句修改为“国内已有学者将 social mindfulness 的翻译改为了“社会善念”(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2018a;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耀中,2018b)。”

**意见 6:**“1 引言”第三句写道“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以及正念所具有的佛学教义,

研究认为“社会善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更具中国特色”。首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导致作者认为需要将“social mindfulness”翻译为“社会善念”。其次，“研究认为”的表述比较宽泛，建议具体为“本研究认为”或“我们认为”。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点评。将此句修改为“考虑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诠释，以及正念的佛学教义所产生的歧义，本研究认为“社会善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更具中国特色。”

意见 7：“1 引言”第二段中“该范式要求个体在两种颜色的五支笔中选择一支，例如一支红色笔和四支绿色笔，颜色是区分的唯一标准，对不同色笔的选择是人们战略选择的结果”中的“颜色是区分的唯一标准”的表述有点奇怪，“对不同色笔的选择是人们战略选择的结果”的表述也令读者费解。我建议将该句改为“该范式要求个体在两种颜色的五支笔（例如一支红色笔和四支绿色笔）中选择一支”。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认真指导。将此句修改为“该范式要求个体在两种颜色的五支笔（例如一支红色笔和四支绿色笔）中选择一支。”

意见 8：“1 引言”第二段中的“国内学者基于前人研究进行操作性界定”也不太恰当。首先，所引用定义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并不能算作是操作性定义。其次，该表述也不恰当，没给出界定的对象。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耐心点评。删掉“操作性定义”的表达，将此句修改为“国内学者指出社会善念是“个体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对‘关注他人’的自我控制，即有意识地识别情境中他人可支配的选项，可理解为一种心智技能；并愿意做出不限制他人选择的决策，可理解为一种意愿动机”(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张庆鹏, 2017, p. 1103)。”

意见 9：后面部分类似的问题较多，请作者自行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评阅，使文章得到更好的修改和提高。文章作者们和邀请的友善同仁们，协助一起将全文进行了规范表达修改，详见文章标蓝部分。

.....

**编委意见：**论文有显著的理论贡献。经过几轮修改后，达到了发表要求。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选题很重要，告诉我们中国的好人是什么样的。两位审稿人都一再提醒文字的问题，请再次提醒作者注意文字表述的提高。